

闲说坤甸潮州话

作者：黄新聪（上）

我2007年曾三赴雅加达，参加庆祝母校——印尼坤甸振强学校建校100周年筹备工作；住在校友会主席许先生家里。许先生原籍广东揭阳，讲潮州话。在他家里，我们常用潮州话交谈，他的印尼佣人——司机、女佣和厨师往往神态讶异地注视我们的谈话，有时还窃窃私语。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司机带我外出，突然问我：“端（印尼语为“大人”，对上级和客人的尊称）从中国来，怎么会讲坤甸话？”“坤甸话”印尼语为“Bahasa Pontianak”。我当时愣住了，什么是Bahasa Pontianak？问他。司机答道：“端同大老板平日讲的就

是Bahasa Pontianak！”我幡然大悟。他说的“坤甸话”就是潮州话！

一次，我去探望姑妈，同姑妈和表弟、表妹等人用潮州话交谈。回住处时，她家的司机开车送我，上车后，司机笑眯眯地问我：“Tokei（印尼语“头家”，即老板）的坤甸话讲得很好，你们在中国是不是也讲坤甸话？”

原来雅加达有些人把潮州话当成坤甸话。这不奇怪，雅加达的华人原先多为福建、广府、客家人，讲的是福建、广州、客家话，很少听到潮州话。1965年的“9.30”事件时，苏哈托政权以镇压共产党之名，残酷杀害无辜群众，西加

里曼丹是重灾区，数以万计的华人惨遭杀害，十几万人因受迫害而流离失所，从西加里曼丹各地逃难到雅加达、泗水等城市，于是雅加达的坤甸人多起来了，潮州话也随之进入雅加达华人社区；这些讲潮州话的人大多是从坤甸来的，因此当地居民就把潮州话叫——“Bahasa Pontianak”坤甸话。

坤甸是华人聚居的城市，全市50万人口中，华人就有20多万。华人中以潮州人和客家人为主，在商业区老埠头通行潮州话，隔岸的工业区新埠头则多讲客家话。二战前，坤甸华人社会分帮分派——潮州帮和客家帮；帮派的划分不是以地缘，而是以方言定格的。如历史上为“潮州九县”之一的大埔以及揭阳县属下的河婆（今揭西县）籍居民讲客家话，因此不属潮州帮。为数不多的海南人和福建人因其语言同潮州话同属闽南语系则讲潮州话，归属潮州帮。同样，讲广府话的广州、肇庆、四邑各县以及广西、江西省籍的居民因其语言接近客家话，都归属客家帮，讲客家话。

潮州帮和客家帮很少有通婚的，子女也都各自到潮州人或客家人办的学校读书。直到二战

后，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发、进步思潮的冲击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在爱国侨领的倡导和广大侨胞的支持下，坤甸华人社会分帮分派的局面才逐渐消失；青年人崇尚自由恋爱，婚姻已冲破帮派界限；学生也都就近到中华公会主办的“中华公学”名下的中学和各小学读书。学校还规定，教师和学生一迈入校门，一律讲国语——中国普通话。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坤甸华人社会是封闭的，华人居住的地方都集中在一个区或街道，他们有自己的社交活动圈子，在华校读书，很少同当地土著人交往，除了去“鱼巴刹”、“菜巴刹”（“巴刹”即市场）买鱼买菜，乘坐三轮车和搭乘来往新老埠头的“舢舨”，需同当地土著人接触外，都不讲印尼话；因此不少华人在坤甸生活了几十年，还不会讲印尼话。这在印尼是很独特的现象。相反一些在华人商店、工厂或家庭做工当佣人的土著人，因生活在华人社会的圈子里，不但听懂而且还会讲潮州话或客家话。这在印尼也是罕见的另一种现象。

1995年，我首次回坤甸探亲，那时还是苏哈托暴政统治时期，虽然中印（尼）

两国已恢复外交关系，但当权者对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仍抱敌视态度，中国人成了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对象。我回印尼探亲的“经济担保人”劝导我，在机场等公共场所尽量讲潮州话，那些贪官污吏便以为你是坤甸人，不便对你敲诈勒索。果然如此。一次，我们从雅加达乘飞机去坤甸，在机场过安检关时，我和夫人故意讲潮州话，安检人员把潮州话当成坤甸话，向我们搭腔：“Pulang Pontianak？”（回坤甸？）答曰：“ya！”便安然过关。后面两人因讲普通话，便受到盘问刁难，要他们打开皮箱检查，虽未查出违禁品，但还是给了安检人员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咖啡钱”，才倖然登机。

俗话说“潮州九县，县县有语”，指的是潮州九个县，每个县都有各自发音迥异、腔调不同的地方方言。同样是潮州话，但潮安、澄海、揭阳同潮阳、普宁、惠来就大不相同。如“鱼”字就有“He”，“Hi”，“Hu”几种读音；有的地区“猪肉”叫“猪ba”；再如“新”字，各地有“xin”“xing”或“seng”的不同读音。潮州话中没有“睡觉”之词，除了“午睡”外，无法书



坤甸老埠头芳伯纪念厅副厅
（昔日坤甸客家人活动场所）